

6月30日下午，國民黨宣傳部長公開宣布，雖然休戰期限已在6月30日中午滿期，雖然雙方尚未達成滿意的協定，政府已經要求我繼續調處，以期和平解決。政府對共產黨軍隊將不發動任何攻擊，而命令它的軍隊採取守勢，等待問題的解決。政府給了我一份蔣委員長於7月1日向他的司令官們發布的命令的抄件，在命令中規定：「如中共軍隊不進攻我軍，則我軍亦不進攻中共軍隊。設中共軍隊向我軍進攻，則我軍為自衛、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及維持地方治安計，將集中力量予以反擊……」

周恩來將軍隨後交給我一份命令的抄件，他說，這是毛澤東主席與朱德將軍於7月1日向共產黨軍隊發布的命令，其內容與國民政府向其軍隊發布的命令相同。

這樣的沒有任何時限的停止衝突，為談判提供了延長的時間，不過，沒有發布任何正式的停戰令。對於使兩黨不和的幾項極其重要的爭端已經達成協定，只是在關於軍隊整編方案的修改問題達成部分的協定之後，談判才陷於破裂，這次破裂主要是由於未能找到能為雙方接受的關於地方政府的方案。不管是什麼原因，看來清楚的是，在休戰期間的談判中，共產黨是比較願意就停止衝突達成協議的，政府則提出如此苛刻的條件，而使共產黨不大可能接受這些條件。看來同樣清楚的是，某些國民黨文武領袖的力量和權力是以武力解決為目標的，他們的信念是，全面戰爭要比目前伴之以經濟與政治停滯的半戰爭狀態為好。

二十四．五人會議舉行會議討論地方政府問題；衝突的蔓延和局勢的惡化

當我在已延長的休戰期限滿期以前，與蔣委員長的最後

一次會談（6月30日）中，我曾指出，由於他的軍事領袖們要他立即執行武力政策（為此他們已制訂了一切計畫）解決問題，產生明顯而強大的壓力之下，局勢是危險的。面臨這個危急時刻和談判的僵局，我於7月2日發了一份電報給副國務卿，在電報中，我要求他把他和范宣德先生對於局勢、以及或許會突然發生的問題之非正式估計告訴我。在提出這個要求時，我解釋說，由於我已深深地捲入局勢的發展之中，因此我擔心自己可能會缺乏客觀且適當的看法。副國務卿在其7月4日的答覆中大致肯定了我對局勢的估計，並且表示同意這樣的看法：由高級官員們進行會談，討論政治問題以求解決，似乎是一種穩妥的策略行動。

在上述6月30日的會談中間，蔣委員長說，他將考慮我的建議，即召集一個由政府 and 共產黨代表組成的特別小組，討論中共軍隊依照政府要求而撤出的地區之地方政府問題。他同意親自會見周恩來將軍，並且說，如果我的建議得到批准，他將親自向周將軍提出這樣一種辦法。

這個通稱為「五人會議」的特別小組之召集，為政府所批准，這個會議的第一次會議於7月3日舉行。政府參加這個會議的代表是：外交部長王世傑博士、參謀總長陳誠將軍和政協的主要成員邵力子先生。共產黨的代表是周恩來將軍和董必武先生，後者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和政協代表。這個小組的任務是解決地方政府的問題，這是阻礙兩黨獲致解決辦法的唯一嚴重問題，這個問題也導致談判於6月底陷於僵局。

7月9日，我同五人會議的政府代表們討論了他們會議的結果。他們指出，政府堅持中共軍隊須撤離下列四個地區：熱河省承德以南（包括承德）、滿州的安東省、膠濟鐵路和蘇北。他們解釋，政府並不要求共產黨在它的軍隊撤出

的所有地區裏既交出軍事控制權又交出地方政府，而只是要求在上述四個特別指定的地區裏這樣做；這是為了消除對政府的任何威脅，並且為政府提供安全環境。這些代表們說，在中共軍隊撤出的所有其他地區之地方政府問題可由政治協商會議或政治協商會議綜合小組討論解決，但上述四個地區之地方政府問題必須在能夠發布永遠停止衝突的命令前予以解決。邵力子先生解釋，五人會議舉行三次會議之後，沒有達成協定，已於7月6日休會，沒有約定進一步談判的日期，據協定，會議的政府代表須向蔣委員長報告，共產黨代表須向延安報告。蔣委員長最初說，他需要時間來考慮局勢，後來他指示政府代表同共產黨繼續談判，但是關於進行談判的方式至今尚未作出決定。

我對於蔣委員長准許由五人會議進行進一步的討論表示高興，並且強調解決地方政府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因為這是目前阻礙發布停止衝突命令的關鍵性問題。我也指出，除非達成某種協定，否則任衝突繼續蔓延將會非常危險。與政府的信念相反，我的意見是：共產黨強烈地渴望這一項臨時安排獲致協議，這項安排將容許立即發布停戰令。我說，周恩來將軍擔心政府企圖完全拋棄政治協商會議，因此針對目前問題的處理辦法，或許是得同意盡速指定一個日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或綜合小組，討論地方政府問題，以這樣的方式來向共產黨提供保證。我最後說，現在已就有關「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和軍調部執行小組裏由美國代表解決意見不一致的權力之文件達成協議，尚待解決的唯一重要問題是「地方政府問題」。

7月11日，在與俞大維將軍會談時，我表示這樣的意見：對於目前問題的解決在於從五人會議獲得結果，這個會議正在討論地方政府問題。我建議，以在江蘇的關鍵地區設立由國民政府、共產黨和美國的文職代表組成的若干小組來處理

這個問題或許是可行的。這些小組將作為上訴法院，對公平分配財產作出裁決，遏止違規事件並能控制地方政府及其管轄下的協定行為。

我於7月13日向周恩來將軍提出同樣的意見。我說，目前的僵局似乎起因於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根本問題——即農民問題、土地問題、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租稅和關係。我指出，我對這些問題的瞭解並不充分，因此無法提出解決中國根本問題的辦法。我建議，或許可以為逃亡地主返回家園制訂一項過渡政策，並且設置一個由一名國民政府文職委員、一名共產黨文職委員和一名熟悉中國情況的美國文職委員組成的特設機構，全面監督這項政策的執行。這個特設機構又可以在各縣設置下級機構，這些下級機構可以控制逃亡者返回家園的比率，並且在過渡期間對有關土地調整的政策作出仲裁或加以解釋，直至制憲會議對全部問題作出決定。

周將軍回答說，由於牽涉整個土地政策問題，因此有發生許多爭論的危險，不僅在四個指定的地區裏，而且在其他地區也是如此。他解釋說，共產黨的土地政策與政府的土地法差異很小，因為兩者都是以孫中山先生的原則——即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權——為基礎的。他斷言，國民黨的主要興趣不在土地問題上，而是在控制地方政府的問題上，並且指出對目前僵局的三種可能的解決辦法：（一）處理難民問題——他說，這未曾得到政府的同意；（二）解決土地問題——這是極為複雜的，將需要很多時間；（三）准許國民政府接受中共軍隊撤出地區裏的地方政府——這是共產黨不能接受的。周將軍說，他相信，說服國民黨先解決軍事問題，把地方政府問題留待以後解決，是可取的。

在我於7月11日與俞大維將軍的會談中，我對於五人會議未能為地方政府問題找出一項解決辦法表示失望，並且

指出，未能求得解決辦法（即使只能暫時解決問題），在這個時刻將無可避免地導致內戰，特別是在這麼危急的軍事局勢之下。我說，蔣委員長同意這個五人會議舉行會議似乎是為了使我高興，同時卻向政府代表們發出明確和詳細的指示，因此他們在討論中採取頑固態度，以致沒有妥協的基礎。

7月11日晚些時候周恩來將軍告訴我說，五人會議曾於7月9日和10日舉行會議；政府代表們於10日表示，他們不能改變蔣委員長對四個地區地方政府和民政的指示之實質，他們只能許諾，當政府接受這些地區時，他們會將這些地區裏現存的共產黨機構考慮進去。這項基礎沒有被周將軍接受，他建議全面討論關於在所有共產黨控制地區裏的地方政府問題，以便不僅在所有其他地區，也在四個指定地區獲得一項通用的解決辦法。他說，政府代表們回答說，其他共產黨控制地區的問題只能在國民政府改組以後才可加以討論。周將軍擔心共產黨交出這四個地區卻沒有獲得為其他共產黨佔領的地區任何保證，因此他說，雖然共產黨可以考慮進一步減少它在四個地區裏的軍隊，但是它不能接受把中共軍隊和共產黨的地方政府從這些地區完全撤出的要求。

在7月份的這個期間裏，軍事局勢開始逐漸惡化，衝突蔓延到中國本部的各個地點。軍調部的委員們曾力圖以下的辦法使局勢得到控制：於7月5日向所有的執行小組和在長春的前進指揮所發出一份電報，在電報中說，國民政府和共產黨業已聲明，在進一步談判獲得結果以前，在全國繼續實行休戰。委員們命令所有的司令官不得採取包括前進、攻擊和追擊等進攻行動。這道命令的效力是短命的，這其間很快發生了其他事件，這些事件在在表明，軍事局勢和政治局勢都進一步惡化了。

7月8日，周恩來將軍送給我一份備忘錄，附有一份中

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7月7日即中日戰爭爆發週年紀念日發表的宣言。這份宣言強烈而狠毒地攻擊美國的對華政策，並且指出共產黨認為美國給予國民政府的軍事和財政援助，助長了國民黨內戰政策，因此提出強烈抗議。我以前對這類宣傳攻勢不加評論，但是這次事件的巧合使我告訴周恩來將軍，這種宣傳攻勢讓我與國民政府的談判關係受到嚴重的打擊，因為莫斯科也發出了同樣的宣傳，當這種宣傳攻勢繼續下去，我在調處和停止衝突方面就無能為力了⁴⁰。由於五人小組的討論沒有結果，且也將不再繼續開會，我的調處顯然將越來越困難。7月14日，蔣委員長從南京動身到牯嶺去，這是於事無補的，這意味著他不在南京期間談判將大受阻礙。

從軍事觀點來看，局勢有益趨嚴重的跡象。政府軍隊繼續追擊在漢口以北突圍向西北逃走的中共軍隊。在中共軍隊對膠濟鐵路的攻擊（於6月7日開始）平息之後，政府軍隊沿該鐵路線反攻，公開宣布要收復中共軍隊自6月7日以來佔去的地方。7月11日，共產黨指責，政府軍隊從西安地區進入山西南部，並且正在沿同蒲鐵路向北進攻共產黨地區。政府指責，中共軍隊於7月13日在蘇北開始進行一次攻擊，而共產黨則反指責，政府軍隊於7月15日在這個地區發動了一次攻擊，並且向我展示一份據稱是為部署這次攻擊而發布命令的抄本。政府代表們說，共產黨在冀東正在準備一次攻勢，並且指責，蘇聯的顧問和飛行員正在各地為共產黨服務。

像往常一樣，目前的問題是國共雙方採取報復行動的嚴重結果。我告訴政府代表們，政府軍隊繼續進行膠濟鐵路沿

⁴⁰ 本書有單獨一章將論述共產黨對美國的態度。

線的戰役是錯誤的，特別是由於這次戰役牽涉了並非中共軍隊於6月7日以後佔領的若干地方。我又告訴政府代表們，或許可以很快地取得共產黨的同意，撤離於6月7日以後佔領的地方，而不須以爭戰的方式來奪回它們。我告訴周將軍，在此期間，政府促使我注意下列情況：中共軍隊在南京以北不遠、大運河之西的威脅行動；中共軍隊從南北兩方對膠濟鐵路線的威脅行動；中共軍隊針對滄縣與德縣之間津浦鐵路的軍事行動。

隨著軍事局勢的惡化，某些國民黨官員便壓制對國民政府公開的批評。中國民主同盟兩位著名的自由主義分子在昆明被身分不明的人（後來據透露是昆明警備司令部的特務）暗殺了，而且有種種跡象表明，國民黨特務正在國內其他地方恐嚇民主同盟的重要盟員和中國自由主義分子。這個時期裏，共產黨的活動與延安指責美國對華政策的宣傳攻勢相配合，開始集中對付美國駐華的海軍陸戰隊。7月中旬，牽涉共產黨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第一個嚴重事件發生了——共產黨在冀東綁架美國海軍陸戰隊員七人，拘禁了好幾天才釋放。接著是共產黨於7月底執行了縝密的計畫，成功伏擊了由美國海軍陸戰隊護送、從天津開往北平的汽車運輸隊，在伏擊中有三名美國人死亡，十二名受傷⁴¹。

我於7月13日同俞大維將軍討論局勢時向他指出，三人小組正面臨一個困難時期，鑒於蔣委員長即將前往牯嶺，在這個時期中或許不可能進行談判；必須作出一切努力穩定軍事局勢，以便避免內戰。我談到政府明顯地不願意派遣執行小組到漢口以北的關鍵地區去，並且表示我對這種態度的關切，因為唯一明顯的理由可能是政府容許在這關鍵時期繼

⁴¹ 這個事件將於本書後面一章中予以描述。

續採取軍事行動而不受到監視。如果事情是這樣，進攻的軍事行動有所發展，我將被迫退出談判。我又補充說，若非政府的軍事行動發展為明確的敵對行動，我當然無法提出任何具體的指責。

俞將軍在評論談判的現狀時告訴我，如果周恩來將軍願意，蔣委員長將再一次參與地方政府問題的討論，但是共產黨必須撤回它要在中共軍隊撤出之地區保留保安隊的要求。（蔣委員長以前曾同意保留這種部隊。）

在同一天（即7月13日），周恩來將軍向我指出，迫切需要全面休戰。他解釋說，如果國民黨實行其於7月15日在蘇北進攻的計畫，像他擔心會發生的那樣，一定會在山東爆發戰鬥，因為這兩個地區是在同一個中共軍隊司令員指揮之下。在山西省南部也存在同樣的危險，在那裏，在胡宗南將軍和閻錫山將軍指揮下的政府軍隊即將發動攻勢，如果那樣，共產黨將以進攻大同來報復。周將軍覺得，地方性的休戰是無效的，如果要避免報復，必須實行全面休戰。談到地方政府的問題，周將軍說，如果國民政府不改組，這個問題不能得到解決。他又說政府的立場是前後矛盾的，因為它曾經聲明，在軍事問題獲得解決以前，將不討論政治問題，現在它卻又堅持要解決地方政府問題，而這純粹是一個政治問題。

俞將軍於7月16日告訴我，在江蘇長江北岸的共產黨軍隊在前一天發起一次攻擊，力圖消滅那個地區精銳的政府軍隊。我表示不同意俞將軍的話，因為我不相信共產黨軍隊能夠這樣做，並且指出，這是與政府原本說法（即它能在三至六個月的時間裏消滅中國所有中共軍隊）相違背的。我提出，中共軍隊進行這次攻擊，或許是想抵消他們所擔心的政府軍隊在蘇北準備發動的攻擊。我向俞將軍描述了中國財政

和經濟結構的弱點，並且說，如果蔣委員長對談判繼續採取目前的態度，內戰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人民強烈地反對內戰）。我認為，蔣委員長相信，在談判的暫停期間，軍事形勢的發展可能對政府有利，但是形勢可能並不依照他的信念而發展。我指出，一項完全停止衝突的協定在6月份業已起草並經雙方同意，它的履行僅僅等待地方政府問題的解決，在這個問題上蔣委員長卻繼續拖延。我說，蔣委員長的司令官們正在引導他進入一種難以控制的局勢，當這種糟糕的局勢底定時，這些司令官就將呼籲援助，而那時已不會有援助了。在之後幾天同俞將軍進一步的討論中，我提到在昆明暗殺兩名民主同盟成員，以及在這種環境下其他相信自己生命受到威脅的中國人，紛紛到昆明美國領事館避難的事，並且說，談判不能在這樣的氣氛下進行。當俞將軍說中共軍隊已在江蘇開始進攻並必須承擔此後果與責任時，我指出，繼續採取這種態度將必然導致內戰，並警告他，政府軍隊在山西南部進一步前進，就可能導致中共軍隊進攻大同近郊。我最後說，軍調部的努力顯然同談判一樣陷於停頓，但是我願意作出最後的最大努力以便獲得解決。

7月16日晚些時候，我同周將軍討論了局勢。我說，關於軍隊配置問題，我們已非常接近於獲得解決，我覺得必須作出格外的努力，對地方政府問題尋求一項解決辦法。我告訴周將軍說，雖然他顯然擔心若同意了對於地方政府問題的一項決定，那麼在進一步考慮全面的政治解決時，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或許會被排除，但是他應該記住，我或許能夠為召開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取得國民黨的同意；而且，如果局勢惡化，發生內戰，政治協商會議將無法適用於任何有益目的。我解釋說，除非我們能就特殊的初步文件達成協議，我就不能說服蔣委員長發出停戰令。我又說，從軍事觀點看，爭論的問題是小問題，但是從政治觀點看，這些問題卻是非常困難的問題。我於是提出一項建議供周將軍考慮：共產黨

保持在日本投降以前佔領的縣，而撤出在日本投降以後佔領的縣，並允許政府予以接收；在由政府接收的縣裏，關於土地問題達成某種臨時協議，在那些長期處於共產黨控制下的縣裏，土地調整的問題等待國民政府改組後再行解決。

7月17日，周將軍告訴我說，由於衝突蔓延和政治性的暗殺，他發現要說服他的人民接受政府關於蘇北問題的要求越來越困難。談到我建議的解決辦法，他說，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前，國民黨也曾提出一項相同的建議。他指出，在日本人佔領期間，日本軍隊僅僅控制某些城市和少數的主要交通線，而城市和交通線周圍的地區和許多村莊則在共產黨的正規軍和游擊部隊手中。他說，目前在日本人撤出的地方，共產黨都建立了地方政府，因此，如果中共軍隊撤出這些地方，政府軍隊開入，兩黨的軍隊將會密切接觸而必然發生衝突。周將軍繼續說，自中共軍隊撤離長春以來，共產黨發現我提出的軍事方案幾乎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又說，不過，如果蔣委員長以武力和威脅，或以迫使共產黨讓步的辦法努力達到其目的，共產黨被趕進一個角落，那麼共產黨寧願抵抗而不屈服，因為屈服將意味著蔣委員長會提出越來得寸進尺的要求。

中國局勢的惡化，以及圍繞著蔣委員長的反動政治與軍事集團所表現的決定性勢力，使我確信，在調解的努力中，最好能獲得一位德高望重並且在中國有長久經驗的美國人的幫助。有了這種意圖後，我便推薦北平燕京大學的校長司徒雷登博士擔任美國的駐華大使。7月11日，美國參議院批准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此後不久，他就前往南京呈遞國書並且開始同兩黨的代表進行討論。司徒雷登博士瞭解中國及其人民心理，對中國語言運用自如，他受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同樣的尊敬，這使他具備了參與調解的努力的極好條件。他的出場將可抵消對於我不瞭解中國事物的批評。

司徒雷登博士抵達南京不久，7月26日，周將軍在談到衝突的蔓延和國民黨秘密員警的恐怖活動時提出，只有兩項辦法可以擺脫目前的僵局：（一）立刻頒發無條件的停戰令，同時將休戰期間於6月份完成的各項協議付諸實行，特別是在滿州停止衝突和重新頒發在中國本部停戰的命令。如果能就這兩項文件達成協定，其他協定就應付諸實行，例如恢復交通、在執行小組和軍調部內部意見不一致時的決定權、在特殊的初步文件中所包含對軍隊整編方案的補充規定——這些文件付諸實行可以不涉及地方政府問題。然後可以依照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對改組政府問題舉行討論，隨後再討論地方政府問題。

周將軍說，他樂於沿著這步驟討論詳細的程序，並建議政府和共產黨的代表同司徒雷登博士會晤，就國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改組問題進行初步討論。當這些初步討論達成協定時，就必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綜合小組，以便獲得對這一協議的批准，因為依照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改組政府是需要所有黨派同意的。周將軍繼續說，我應該處理停止衝突的問題，而上述的其他人則從事於討論改組政府問題。（二）周將軍說，除上述辦法外，唯一可供選擇的辦法就是全面內戰。如果發生那種情況，他認為美國就將被迫重新考慮它對中國的政策，並且將不會援助一個被內戰所分裂的國家。

在進一步討論擺脫目前僵局的第一項辦法時，周將軍表示擔心，蔣委員長在同各黨派就改組政府問題進行商議以後，或許會以他個人的名義宣布政府將予改組，而不是通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綜合小組。這樣的行動將構成進一步的跡象，表明蔣委員長的意圖是一點一點地拋棄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直至達到這樣的程度，那時這些決議將完全被拋棄。

7月31日，我同俞大維將軍坦白地討論了目前的局勢，

並竭力使他獲得這樣的印象：按照我和司徒雷登博士的意見，從美國報紙對中國發生的事件的反應看來，主要的損失是蔣委員長威望的降低，這是很令人遺憾的，因為蔣委員長或許是這時中國所擁有的最偉大的首腦人物。蔣委員長的顧問們正在給予他以狹窄且帶偏見的勸告，以致局勢看來似乎沒有希望。蔣委員長自己的幕僚曾告訴我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是不能公開發表的。我堅持說，目前政治局勢比軍事局勢更為重要，局勢向內戰的方向惡化要求在最高一級謀求解決。

目前局勢中的一個危險因素是秘密員警，許多曾經表示過任何自由觀點的人都受到他們的監視。最近發生的事件，是一位在美國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人士的死亡，他在秘密員警的追捕下躲藏在兩個不同的地方，最後中風而死。一個上海的和平代表團在抵達南京時遭到粗暴的攻擊，這種攻擊持續了五個多小時，卻沒有任何積極行動去制止。當我把這些事情告訴蔣委員長請他注意時，他說，他也處於困難地位，他必須使許多自由主義者處於監視之下，免得他們發生什麼事情，政府將因此受到責難。我向俞將軍談到，在昆明發生暗殺事件之前，一位消息靈通的美國人就曾告訴我，這種行動即將開始了。對美國人來說，中國受過最高等教育和最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士都遭到明顯迫害，且報紙和出版物也受到壓迫，這些都與民主政治的概念截然相反。

8月1日，周恩來將軍向我描述，政府繼續追擊在蘇北、山東和山西的共產黨軍隊，也有政府準備對哈爾濱和安東採取軍事行動的種種跡象，並且說，這些活動似乎表明，政府的軍事計畫是以政府在6月底提出的要中共軍隊撤出某些地區的要求為根據的。他說，如果這些攻擊持續下去，共產黨無疑將予反擊，並且也在其他地區發起攻擊，這樣就會使內戰蔓延。他覺得，政府中的好戰分子贊成打一場全面的內戰，這樣就可使調解的努力終止。周將軍宣稱，共產黨願意避免

內戰，他想到三個可供選擇的辦法：（一）由於內戰已蔓延到廣大地區，應立即宣布在全國範圍內休戰；在6月30日以前起草的所有文件應予簽字並且公布，地方政府問題留待將來討論。（二）用首先處理衝突最嚴重的地區（例如湖北北部、蘇北和山東）的辦法逐個地解決衝突；應派遣執行小組到那些地方去，一處一處地解決衝突，以便最後能實現全面休戰。（三）軍事問題應與政治問題一道解決。周將軍說，他已向司徒雷登博士建議，如果不能立即達成全面休戰，最好討論政治問題並為改組政府制訂程序，以便政治問題與軍事問題能同時解決。

他又說，如果政府拒絕上述所有的三項建議，那麼相當明顯的是，政府傾向於擴大內戰，那樣，共產黨只能採取兩種可能的行動方針：（一）由於政府繼續攻擊和佔領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共產黨必須在那些地區和其他地區發起反擊，其結果將是內戰蔓延。（二）共產黨將發出致中國和美國人民的公開聲明，宣布在中國存在著全面內戰，而局勢將進一步惡化。周將軍的意見是，如果爭論的問題最後以1月10日（中國本部）和6月7日（滿州）據守的陣地為基礎通過談判求得解決，則雙方軍隊須分別撤退到1月10日和6月7日據守的陣地。因此，他不能理解政府繼續拖延談判的意圖，除非它想保持目前佔領的若干地方。周將軍說，如果兩黨都堅持這種態度，那麼談判就將陷於停頓，休戰的整個目的就將化為泡影。周將軍最後建議說，鑒於最近發生的這起牽涉華北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事件，可以草擬一項將他們撤退的計畫，計畫中包括下列規定：軍調部派出執行小組保護北平至山海關之間的鐵路；政府保證其軍隊不利用該鐵路作為進攻鄰近的中共軍隊佔領地區的基地。

我告訴周將軍說，由於把中國推向混亂邊緣的軍事衝突是嚴重的，我得出這個結論：雖然立即獲致軍事解決以便停

止衝突是必須的，但是立即就組織聯合政府開始採取第一個步驟的問題獲致協定，似乎也是為挽救局勢所必須的。司徒雷登博士和我的意見是，就組織國民政府委員會獲致協議，是此刻唯一切實可行的行動。

8月3日，我告訴周將軍說，8月1日司徒雷登博士在牯嶺同蔣委員長的一次長談中，建議組織一個特別小組，包括政府和共產黨的代表，由司徒雷登博士任主席，旨在獲致協定，立即組織國民政府委員會。我解釋說，蔣委員長原則上同意司徒雷登博士的建議，但希望推遲他的決定，直至他有機會同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再一次討論這件事情。因此，我要求司徒雷登博士留在牯嶺，直至我抵達那裏。（在蔣委員長自7月14日至9月底居住在牯嶺期間，我訪問牯嶺九次，每一次的訪問都持續數日。）

周將軍回答說，他覺得在為休戰協議進行談判時，我們力圖解決政府改組問題是可取的，但是他懷疑政府試圖以開始政治討論的辦法來進行拖延，而同時則進行全面內戰。他談到他剛剛接到的政府飛機於8月2日轟炸延安的報告，以及政府計畫從徐州以北向山東南部進攻的種種跡象。他擔心，如果共產黨進行報復，這可能給予蔣委員長以如此施用策略的機會：如果共產黨在談判中同意他的要求，他就可以佔領有爭議的地區，這樣就可以結束衝突；如果他不能通過談判取得這些地區，他就將宣布進行一次全面內戰。周將軍強調說，如果這個問題不從首先獲得休戰協議的觀點出發加以處理，我們就可能面臨這樣一種局勢：當關於政治問題的討論正在進行時，衝突可能越來越猛烈，局勢可能完全無法控制。因此，他覺得當政治討論正在進行時，我們必須謀求某種實行休戰的方法。

我提醒周將軍說，在此刻進行政治討論的建議是司徒雷

登博士而不是政府提出的，對於正在迅速崩潰的軍事局勢，我們是知道的。問題是如何為停止衝突獲致協議。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特別認為牽涉共產黨攻擊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安平事件是令人遺憾的，因為我覺得確實無疑的是，政府對於這一事件的反應將不會有助於停止衝突。

周將軍在評論司徒雷登博士的建議時說，他和我有同樣的看法，即關於政府改組舉行一次非正式的會議是可取的，並認為一旦找到改組的合適基礎，就應將全部計畫提交政協綜合小組。在談話結束時，他表示希望司徒雷登博士在討論的過程中同其他少數黨接觸，以便使它們不會感到被完全孤立於談判之外。

在8月初，看來挽救局勢的主要希望在於以司徒雷登博士任主席的小型非正式小組之召開，這個小組的目的是就組織政協決議中所設想的國民政府委員會達成協定。鑒於在目前情況下要就發出停戰令獲致蔣委員長同意顯然是不可能的，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覺得從另一個角度，即從這個小組的角度來處理問題是可行的。我們的信念是，如果這個小組取得一些進展，蔣委員長將樂於同意停戰，而這時戰鬥在華北正在日益擴大，並有蔓延及於滿州之虞。

二十五．八月份的談判；召開以司徒雷登博士為主席的五人小組會議的努力未獲成功；杜魯門總統和蔣委員長之間的函電往來；軍事和經濟形勢的持續惡化

8月5日，蔣委員長通知司徒雷登博士，同意他提出的